

苏

国 中诗苑 英华

一曲大江东去

历代文士竞折腰

诗文革新称主将



大江东去
浪淘尽千古
风流人物



变起雄豪

出

派词

轼

卷

111
L421
249

古

中国诗苑英华

苏轼卷

徐培均 选注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P

1997年11月26日

中国诗苑英华

苏轼卷

徐培均 选注

责任编辑 王延梯

特约编辑 肖 培

封面设计 牛 钧

内版设计 赵 岩

责任校对 张华芳

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

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

邮政编码 250100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8.5 印张 213 千字

1997 年 4 月第 1 版

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

ISBN 7-5607-1746-2/I·129

定 价：(全十册)118.00 元

序

王运熙

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中，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诗歌、散文、戏曲、小说、讲唱文学等等，各体皆备。其中尤以诗歌成果更见辉煌，源远流长，大家迭出，真不愧有诗国之称。

中国诗歌具有光辉的历史。在先秦时代，先是以四言句为主的诗体流行，后经人们选录三百余篇，编集成《诗经》。稍后则是句式长短参差的楚辞体（亦称骚体）产生，被后人编集成《楚辞》。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，以其丰富的营养，哺育着后世千千万万的文人。到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，五言诗逐步发展昌盛，七言诗也逐步成长，五、七言古体诗成为诗歌的主要样式。在此时期内，作诗成为一种风气，名家辈出，灿烂多姿。之后是隋唐五代。国势强大的唐帝国，经济、文化发达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。唐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，诗苑涌现出不少名家巨匠。诗体方面，除五、七言古体诗外，还形成五、七言近体诗。从此，五言古诗、七言古诗、五言律诗、七言律诗、五言绝句、七言绝句这

六种诗歌基本样式，长期为人们所遵用，直到现代。宋承唐代，文化、文学继续发达。在唐诗的高峰后面，宋诗往往写得机智而富有理趣，别开生面，与唐诗争胜。同时，在唐五代形成的词（定型的长短句），至宋代繁荣昌盛，形成了诗、词两体双峰对峙、各擅胜场的局面。在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之后，人们一提到中国古代诗歌，总是首先想到唐诗、宋词，它们标志着中国中古时期诗歌的辉煌成就。以后在元、明、清时代，五、七言诗和词继续发展，也产生了许多名家、佳作，但总的说来，诗人们以学习、宗法唐、宋为主，创造性比唐、宋较为逊色。此时期还出现了新型长短句散曲，也有名家佳作，惜表现的广度、深度比不上词。这时期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，转移到了戏曲、小说方面。

这套《中国诗苑英华》丛书，选择历代成就最为卓越的少数诗家、词家，编选其部分名篇佳作，供广大读者学习欣赏。于先秦取屈原，于汉魏两晋南北朝取陶渊明，于唐取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，于宋取苏轼、陆游、李清照、辛弃疾。这十位大家，代表了各个历史时期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，的确不愧为诗苑中光彩最为夺目的英华。他（她）们的诗歌内容广阔深厚：热爱国家民族，甚至愿意为之赴汤蹈火；关怀人民痛苦，希望社会安定；憎恨黑暗腐朽势力，予以揭露和鞭挞；描绘山川草木，展示祖国和乡土的辽阔美丽；歌咏爱情和亲朋情谊，流露真挚深厚的胸怀，等等。这些，对于我们培养热爱祖国人民、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，认识古代社会的诸般情状，认识大

诗人的高尚品格，从而陶冶自己的情操，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。从表现形式看，十位大诗人都是第一流的艺术巨匠。他们构思深邃，才华横溢，语言精炼生动，技巧变化多端，风格或奔放流畅，或深沉顿挫，或平淡隽永，或缠绵曲折，多姿多彩，无不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，使我们获得丰富的美感享受，和从事创作活动的启发和借鉴。

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，是为了促进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，为创作新时代的文学提供营养和借鉴。希望这套丛书在这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。

1996年12月

前 言

在中国文学的天宇上，苏轼是一颗光芒四射的行星。他多才多艺，诗词文赋以至书画，样样皆精，成就杰出。这是中华民族的瑰宝，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！

苏轼，字子瞻，又字和仲，号东坡，宋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）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眉州（今四川眉山）。父苏洵，字明允，号老泉；弟苏辙，字子由，号颍滨：都是著名作家，因此人称“一门父子三词客”。在古文唐宋八大家中，他们就占了三个席位。三苏中，以苏轼的影响为最大。

少年时代的苏轼便发愤读书，“奋厉有当世志”，二十岁左右，“学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”（《墓志铭》）。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他考中进士，有谢座师欧阳修书，欧阳修读后，不禁惊叹：“读轼书，不觉汗出。快哉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。”（《与梅圣俞书》）欧阳修领导北宋古文革新运动，诗词文俱称大家，对苏轼的初露才华已如此赞赏。以后的事实证明，苏轼果然超过了欧阳修。

嘉祐六年，苏轼在仁宗御试中名列三等，授凤翔府签书判官，从此他正式踏上仕途。英宗治平二年（1065），凤翔任满，除判登闻鼓院。不久奉父丧还蜀。神宗熙宁二年（1069）服除，授判官

告院及判尚书祠部，这都是职位不高的京官。时神宗拟重用，但王安石方用事，议行新法，苏轼因持不同政见，遂权开封府判官。次年春，差充殿试编排官，也只是做些整理举子试卷的工作。又明年，苏轼知在京难以施展才华，乞补外郡，遂出为杭州通判。在杭州三年，换了三届知府——沈遘、陈襄和杨绘，待他都很好。熙宁七年，苏轼权知密州。其时到任不久的杨绘召还翰苑，他们同舟至吴兴，在垂虹亭作“六客之会”，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。至密州后，修葺北台，苏辙作《超然台记》，他自己也写了不少诗词。九年九月，有诏移知河中府，十一月离密州，次年正月过齐州，老友李常款留逾月。二月，改知徐州，时苏辙由齐州掌书记改任南京签判，兄弟同行至徐州，会于逍遥堂。这年七月，黄河澶州曹村决堤，大水淹及徐州城下。苏轼屡屡策杖，亲率士卒筑堤防洪，害不及城。次年筑黄楼于东门，不久，秦观、王巩、参寥子相继来访。

元丰二年（1079）二月，移知湖州，经过江淮一带，作诗多追怀昔游。至高邮，秦观、参寥同船，四月底到湖州，尝分韵作诗。七月，御史中丞李定、御史舒亶摘诗句，以为讥切时政，攻击新法，遂被捕下御史台狱，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次年二月，责授黄州团练副使。苏辙、王巩、王诜以及一应收有苏轼文字的大小官员俱遭牵连。在黄州期间，他躬耕州之东坡，筑雪堂以居，始号东坡居士。政治上的沉重打击，使苏轼的思想和诗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这一时期的作品甚多，呈现了不同往常的特色。

元丰七年七月，苏轼在量移汝州的途中经过金陵，专程拜访了退休在家的王安石，大释前嫌，深感“从公已觉十年迟”。因为他们的文章道德大致相埒，所不同的仅是往日在推行新法上看法不同而已。离别了王安石，北上至南京，上书乞居常州，获准后南归。

元丰八年三月，神宗崩，哲宗继位，高太后垂帘听政，起用

司马光、吕公著等旧党人士，苏轼亦被起知登州。七月自常赴登，到官五日，除尚书礼部郎中。十二月，除起居舍人。次年改元元祐，三月除中书舍人，九月除翰林学士，“被三品之服章”。这一阶段，可谓青云直上。一次高太后召见，问他“何以遽至此”，苏轼不免诚惶诚恐，连忙解释道：“臣虽无状，不敢自他途以进。”表明未走过后门。于是高太后安慰道：“此先帝（神宗）意也。先帝每诵卿文章，必叹曰：‘奇才奇才！’但未及用卿耳。”说罢皆哭泣，然后赐金莲烛送归翰林院（见《宋史·苏轼传》）。可是好事多磨，不久洛蜀党争开始，苏轼力求外郡。元祐四年春，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，六月经湖州，作后六客之会。时秦观之弟秦觏从学于杭州，甚得关注。在杭时，疏浚西湖，筑长堤，修六井，颇多善政，并与刘景文、参寥子等相唱和，不乏佳作。六年正月，除吏部尚书；二月，改翰林学士承旨；五月，兼侍读学士。秋七月，贾易、赵君锡弹奏不已，苏轼又乞补外，遂知颍州，闰八月到任，时陈师道为州学教授，赵令畤为签判，相与唱酬，尽一时之乐。七年三月，改知扬州，七月除兵部尚书充南郊卤簿使，八月兼侍读学士，冬十一月，除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充礼部尚书，一直到次年夏天。此时苏辙也由尚书右丞兼门下侍郎，位列执政大臣，兄弟二人，真是无比荣耀，因此遭到他人忌恨，御史黄庆基、董敦易连连上章论川党太盛，指责他们兄弟二人相为肘腋。为避亲嫌，苏轼又一次乞知外郡。

元祐八年九月，高太后崩，不久哲宗亲政，政局发生变化。冬十月，苏轼出知定州，从此便走下坡路，再无回京的希望。次年改元绍圣，意在继承熙丰新政。三月以后，旧党纷纷遭迁谪，苏辙贬筠州，苏轼初贬英州，改惠州，独与幼子苏过、侍妾朝云同过岭南，其余家属皆安置宜兴。在惠州初居合江楼，继迁嘉祐寺，绍圣三年，营白鹤新居。因《纵笔》诗中有“为报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”之句，宰相章惇觉得他太安稳了，遂贬海南。此

时苏辙亦谪广东的雷州，兄弟相遇于藤州，同行至雷州。六月渡海，七月至儋州，筑室以居，食芋饮水，以写作《和陶诗》为乐。直到元符三年（1100）徽宗继位，才遇赦北归。次年（建中靖国元年）七月二十八日，卒于常州家中。

苏轼一生活了六十六岁，政治上几起几落，道路极不平坦，思想也较复杂。他的世界观中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一面，也有道家佛家消极避世的一面，二者交织，形成旷远的襟怀、豁达的态度，除了在狱中作诗流露过绝望情绪以外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能够处变不惊，超然物外。他的诗词便是他心灵历程的忠实记录。读其诗词，可以想见他的为人；而知人论世，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诗词。

二

近人陈寅恪说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年之演变，造极于两宋之世。”（《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》）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，此时也登上了一个可与盛唐文学媲美的高峰，而苏轼则是站在这个高峰上的人物之一。

在中国词史上，苏轼是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家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：“词自晚唐五代以来，以清切婉丽为宗，至柳永而一变，如诗家之有白居易；至苏轼而又一变，如诗家之有韩愈，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。”明人张綖在《诗馀图谱·凡例》中说得更为明确：“词体大略有二：一体婉约，一体豪放。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，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，盖亦存乎其人，如秦少游之作，多是婉约，苏子瞻之作，多是豪放。”从此一般论词者便将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，少游被推为婉约之宗，东坡被尊为豪放之首。

在东坡词中，豪放的作品不过一二十首，因此有人认为不足以构成豪放派。这是不恰当的。因为看一个流派，不仅要看它的

本质和主流，还要看它在词坛的影响。有宋以来，李冠的《六州歌头》（秦亡草昧）“道刘项事，慷慨悲壮”（明·杨慎《草堂诗余》评）；范仲淹的《渔家傲》（塞下秋来风景异），苍凉郁勃，欧阳修呼为“穷塞主之词”，不可谓不豪放。但与苏词相较，一是数量极少，尚未造成流派的格局；二是气格境界较为单弱，不像坡词境阔气伟，“倾荡磊落，如诗如文，如天地奇观”（宋·刘辰翁《辛稼轩词序》）；“如长江大河，汹涌奔放，瞬息千里，可骇可愕”（宋·费昶《梁谿漫志》卷四）。宋人胡寅在《题酒边词》中说：“及眉山苏氏，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摆脱绸缪宛转之度，使人登高望远，举首高歌，而逸怀浩气，超然乎尘垢之外，于是花间为皂隶，而柳氏为舆台矣。”试读东坡《念奴娇》（大江东去）、《水调歌头》（明月几时有）、《满江红》（江汉西来）、《水龙吟》（小舟横截春江）、《八声甘州》（有情风万里卷潮来）以及《江城子》（老夫聊发少年狂）诸阕，便有如此感觉。

然而苏轼是一位天才词人，所写之词题材丰富，风格多样，“世第以豪放目之，非知苏辛者也”（清·冯煦《东坡乐府序》）。清人周济也说：“人赏东坡粗豪，吾赏其韶秀，韶秀是东坡佳处……”（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）。像《行香子·过七里瀨》：“水天清、影湛波平。鱼翻藻鉴，鹭点烟汀。过沙溪急，霜溪冷，月溪明。”写天容水色，鱼翔鹭点，确是韶秀清丽，耐人玩赏。词自花间以来，多为应歌而作，东坡每遇送行饯别，月下花前，也不乏此类作品，大都风致嫣然，情辞旖旎。如《江城子》（玉人家在凤凰山）咏陈直方之妾嵇氏，也有艳词俚句；在黄州赠州守徐君猷侍女的一组《减字木兰花》，更是风姿婉美，情意缠绵。他的《浣溪沙》（道字娇讹苦未成）一首，清人贺裳《皱水轩词筌》就曾说过：“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，然其《浣溪沙·春闺》曰：‘彩索身轻常趁燕，红窗睡重不闻莺’；如此风调，令十七八女郎歌之，岂在‘晓风残月’之下？”像这样的作品，自属婉约一路，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

他的豪放词。

苏轼介于豪放婉约之间的名作亦复不少。像《水龙吟·次韵章质夫扬花词》、《永遇乐·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》、《贺新郎》（乳燕飞华屋）等等，都是脍炙人口的佳制，大都意境空灵，感情凄恻，气韵不凡，用笔时有高浑之处。此类词正如清人冯煦所云：“刚亦不吐，柔亦不茹，缠绵芳菲，树秦柳之前旃；空灵动荡，导姜张之大轺。”（《东坡乐府序》）

早在元祐年间，苏轼的弟子陈师道就说他“以诗为词”（《后山诗话》）。另两位弟子晁补之和张耒也齐声说：“少游诗似小词，先生小词似诗。”（《王直方诗话》）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。诗与词体性不同，在东坡以前多严分畛域。词与音乐关系极为密切，因此填词谓之“倚声”。诗最初也受音乐的洗礼，但后来大都脱离音乐而成为相对独立的文学样式。唐五代以至北宋，诗词似乎形成约定俗成的分工：诗多反映重大的社会生活，而词多抒写个人心灵中曲折隐微的感情。宋初王禹偁的《点绛唇》，似已出现诗化的苗头，至东坡则进一步以诗为词，做到了“无意不可入，无事不可言”（清·刘熙载《艺概》四）。它被用来描写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歌颂普通的劳动人民；它被用来抒写政治上的得意和失意，表达个人的理想与抱负。至于伤今、吊古、狩猎、悼亡、赠友、怀乡，则无所而不可表现。他为“香而软”、“微而婉”的词境注入了新鲜血液，开拓了广阔的领域，因此宋人王灼说：“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，偶尔作歌，指出向上一路，新天下耳目，弄笔者始知自振。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，十有八九，不学柳耆卿，则学曹元宠，虽可笑，亦毋庸笑也。”（《碧鸡漫志》卷二）

苏轼学际天人，奄通经史，因此他不仅移诗作词，甚至以文为词，而且善于用典。如《浣溪沙》首句“长记鸣琴子贱堂”，结句“仲卿终不忘桐乡”，即用《说苑》宓不齐、《汉书》朱邑二典。《沁园春》（孤馆灯青）乃怀念其弟子由之作，其中连用了云间二

陆、杜诗、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、牛僧孺诗诸典。前者为小令，一般作者不用典；后者为长调，虽有人用典却未见如此之多。在用典中，苏轼往往不拘一格：有的古典新用，有的死典活用，有些雅典故用，有些僻典浅用。像《南乡子》“破帽多情却恋头”，表面似不用典，实则用东晋孟嘉落帽龙山故事；《浣溪沙》“休将白发唱黄鸡”，反用白居易诗句；《临江仙》“见鹤忽惊心”，不但化用庾信《小园赋》“鹤讶今年之雪”，而且用自作《鹤叹》诗“戛然长鸣乃下趋，难进易退我不如”，二者融合，灭尽畦径。

宋人有“以议论为诗”的作风，这有时也渗透到词中，如果用得好，也会出现佳篇名句。如秦观《鹊桥仙》写牛郎织女相会，歇拍云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明人沈际飞赞之为“化臭腐为神奇”，李攀龙则称此二句“最能醒人心目”。东坡词中也有发议论者，如《满庭芳》云：“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著甚干忙。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？”《满江红》：“浮世事，俱难必。人纵健，头应白。”《西江月》：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新凉。”又：“休言万事转头空，未转头时皆梦。”此类例句，还有不少，语语出以议论，然亦不失为好词，因为它带有感情，挟有气势，能够激动人心。

三

在宋初诗坛上，西昆体风行一时。刘克庄《江西诗派序》云：“国初诗人如潘阆、魏野，规规晚唐格调，寸步不敢走作。杨（亿）刘（筠）则又专为昆体，故优人有得扯义山（李商隐）之诮。苏（舜钦）梅（尧臣）二子，稍变以平淡豪俊，而和之者尚寡。至六一（欧阳修）坡公（苏轼），巍然为大家数，学者宗焉。”这是对北宋前期文学现状最精当的概括。也就是说经过欧阳修和苏轼的创作实践，宋诗才区别于唐诗尤其是晚唐诗，而形成独特的风

格。但是苏轼较之欧阳修，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，都远远胜出，这是欧阳修早已预见到的，已如前述。

苏轼诗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。他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唐人李白、杜甫、刘禹锡乃至白居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但他学识渊博，思维活跃，音律娴熟，技巧谙练，旧体诗词无论是长篇短制、古体律绝，在他手中都如宜僚之丸，随心高下，运转自如。他曾说：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。”（《书吴道子画后》）他的诗词创作，正体现了这种理论主张。“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，就是：‘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’；用近代术语来说，就是：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，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，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。”（钱钟书《宋诗选注·苏轼》）闻一多形容诗词创作是戴着脚镣跳舞，苏轼便是戴着这种脚镣跳出最新最美舞蹈的一位艺术大师。

随物赋形，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，是苏轼常说的几句话。天下景物，似乎专为苏轼这样的诗人而设。山川草木，一经他着笔，便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。像“岭上晴云披絮帽，树头初日挂铜钲；野桃含笑竹篱外，溪柳自摇沙水清”（《新城道中》），汪师韩认为后二句是“铸语神来，常人得之便足以名世。”（见《苏诗选评笺释》卷二）苏轼的很多写景名句是直接从中提炼出来的，如《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》诗：“微雨止还作，小窗幽更妍。盆山不见日，草木自苍然”，是他的得意之作，尝云：“非至吴越，不见此景也。”（《东坡题跋》卷三）又如《和秦太虚梅花》：“江头千树春欲暗，竹外一枝斜更好”，《遁斋闲览》评此句曰：“语虽平易，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。”苏轼集中还有不少题画诗，这是在另一种艺术作品基础上的再创作，很符合他“诗画本一律，天工与清新”的主张。像《王维吴道子画》、《书韩干牧马图》、《续丽人行》、《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》、《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》、《惠崇春江晚景》等等，或阐发艺术理论，或再现画中情景，或发挥

读画时的想象，补充一般人不易觉察的意境，从而使诗画融为一体，相得益彰。

苏轼的写景诗，不仅写了物，而且写了人，情景交融，主体融入客体，浑成自然，了无痕迹。如《寓居定惠院之东……》写谪居黄州时看到荒山上一株海棠：“朱唇得酒晕生脸，翠袖卷纱红映肉。林深雾暗晓光迟，日暖风轻春睡足。雨中有泪亦凄怆，月下无人更清淑”；这里写海棠花像娇艳的美人，美人与花构成一体，然而更妙的是下半篇将作者与花对照描写，相映成趣，似乎山中幽然独处的海棠与远谪黄州的诗人遭际相似、命运相同：“忽逢绝艳照衰朽，叹息无言揩病目。陋邦何处得此花，无乃好事移西蜀？”“天涯流落俱可念，为饮一樽歌此曲”。清人纪昀评曰：“纯以海棠自寓，风姿高秀，兴象微深；后半尤烟波跌宕。此种非东坡不能，东坡非一时兴到亦不能。”（《纪批苏文忠公诗集》卷二十）确是点出了它的好处。这比一般的写景诗不知要高出多少倍！

善用比喻，是诗人形象思维中不可缺少的本领。我国自《诗经》以来就有一个善于比喻的传统，比喻愈出愈奇，愈用愈博，至苏轼可谓达到一个新的高峰。他的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是脍炙人口的佳作，诗中以西施的浓妆比西湖的雨景，以西施的淡妆比西湖的晴色，从此西湖就获得了西子湖的美名。宋袁文《瓮牖闲评》卷五认为西湖“虽与妇人不相涉，而比拟恰好，且其言妙丽新奇，使人赏玩不已”。最突出的是《百步洪》，其中“有如兔走鹰隼落，骏马下注千丈坡，断弦离柱箭脱手，飞电过隙珠翻荷”，四句用了七个比喻，新鲜、贴切而形象鲜明，可谓前无古人。清人查慎行《初白庵诗评》卷中评此诗说：“联用比拟，局阵开拓，古未有此法，自先生创之。”

然而苏轼并不是一位流连光景的诗人，在他的作品中还有反映现实、关怀民瘼的篇章。像《吴中田妇叹》写江南农妇：“眼枯泪尽雨不尽，忍见黄穗卧青泥”；好容易收下稻谷，“汗流肩赭载

入市，价贱乞与如糠粃。卖牛纳税拆屋炊，虑浅不及明年饥”。最后绝望地叹道：“龚黄满朝人更苦，不如却作河伯妇！”因为官吏推行新法，这位农妇想投河自尽了！《秧马歌》既写了插秧农民“腰如箠篲首啄鸡，筋烦骨殆声酸嘶”的辛苦劳累，也写了古代插秧机械——秧马的轻快与省力，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智慧。《鱼蛮子》表现了渔民的艰辛，控诉了赋税的苛重：“人间行路难，踏地出赋租”，故纪昀说，此诗“属香山一派，读之宛然《秦中吟》也！”（见《纪批苏文忠公诗集》卷二十一）《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》如古谣谚，但最后二句“农夫辍耒女废筐，白衣仙人在高堂”，汪师韩《苏诗选评笺释》卷一就指出“刺当时不恤民也”。最尖锐而辛辣的莫如《画鱼歌》，王文诰说：“岂知白梃闹如雨，搅水觅鱼嗟已疏”二句，是“讽当时刑罚之烦也”。

四

苏轼诗集自问世以来，不断有人注释。较早的有宋代赵次公、程颢等四家注和题名王十朋编纂的百家分类注。影响较大的为南宋嘉泰年间印行的施元之父子的编年注本。及至清代，有汪师韩的《苏诗选评笺释》、查慎行的《苏诗补注》、纪昀的批点《苏文忠公诗集》，而冯应榴、王文诰则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并参以己意，分别著有《苏文忠公诗合注》、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》，后者还有总案四十卷，实为苏轼年谱长编。今人孔凡礼有《苏轼诗集》，王水照有《苏轼选集》。苏轼词多厘出单行，往者南陵徐积余有旧钞本傅干《注坡词》残卷，存世者有元延祐七年刻本、毛氏汲古阁六十名家词本、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、朱祖谋彊邨丛书本。龙榆生师据朱本及傅干注本作《东坡乐府笺》，“考证笺注，精核详博”（夏敬观序）。今人石声淮、唐玲玲作《东坡乐府编年笺注》，又加翔实。余编此书，共选取了苏轼的二百八十首诗词作品，在对

这些作品的注释过程中，于上述各家多有借鉴，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。限于时间和能力，书中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，诚望读者不吝赐教。

徐培均

1996 年盛夏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